

何 平/著

现代小说

还乡母题研究

Xiandai Xiaoshuo Huanxiang Muti Yanjiu

本书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何 平/著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

Xiandai Xiaoshuo Huanxiang Muti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何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9-08940-0

I. 现… II. 何… III. 现代小说-小说评论-世界 IV.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8451 号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

何平 著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0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940-0/I · 687

定价: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系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运用叙述学和主题学相关理论，选择现代小说还乡母题作为研究对象。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母题研究的边界作出清晰的厘定，同时提供了比较纯正的母题研究范式。选择母题作为研究视角，向外，可以观察到现代小说还乡母题和20世纪中国现实以及现代中国人心灵世界之间的关系；向内，则可以进入到小说文本的内部构成，思考现代作家如何通过母题的排列组合讲述不同的还乡故事及其用意。不仅如此，以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为个案的考察和探究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

致 谢

感谢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朱晓进教授

目 录

导言 从母题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	1
一、母题和功能性母题	1
二、母题的结构原则和母题链	5
三、文化母题的积淀与传衍	8
四、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现状	12
第一章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构成模式和基本叙事序列	18
一、还乡的启动:还乡的发生和原因	22
二、还乡的实现:还乡者在故乡的不同状态	33
三、还乡的终结:还乡者的命运	72
第二章 现代小说文化还乡和精神还乡研究	74
一、返回原初与走向边境	75
二、回归中重建乡土中国历史	86
三、一个人的故乡	99

第三章 扎根、除根、失根和寻根	108
一、“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08
二、“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	116
第四章 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还乡故事讲述	130
一、动荡、转型时代的现实图景	133
二、“转换”与“安置”中的中国经验阐释	139
三、现代性寓意：故乡想象和身份问题	144
第五章 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的创造性“转换”和“安置”	165
一、中国古典文学还乡母题原型及其传衍	165
二、西方文学还乡母题原型及其流变	194
三、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203
结语	215
参考文献	220

导 言

从母题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

“母题”(motif 或 motive)是一个在叙事学和主题学研究中都很活跃的概念。作为一个具有结构和传衍功能的文学单位,审视文学史上反复出现于不同文本,甚至不同体裁的某一母题,既可以观察到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心理以及审美层面内容,同时如果在长时段的文学和思想发展史上去把握母题的嬗变和转化,又可以找寻到文学的发展规律。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母题研究不但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更为宏阔的文学史描述背景,而且在考察 20 世纪文学如何对已有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方面,母题研究有着其他角度难以替代的优势。

一、母题和功能性母题

就传统的母题研究而言,它一开始所针对的是民间叙事文学。母题是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叙述的最小单位。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美国著名民俗学家汤普森,在他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汤普森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

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①汤普森的母题观在世界民俗研究和民间叙事研究领域影响很大。但必须指出的是汤普森的“母题”观回避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如何去确定“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固然汤普森已经指出:“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角色……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些背景……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②可是依据这样的标准去对母题进行归类,母题的数量将会趋于无限多,使借助母题归类从事的定性分析难以展开和深入。而且,在汤普森的“母题”观中还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故事究竟依据怎样的母题组合原则来结构。就像邓迪斯指出的:“不论什么类型,其结构分析问题大体上相同。这些问题包括找出或确定最小的结构单位,并弄清楚这些最小的单位是如何结合成传统的模式。”^③

相比较而言,苏联文学理论家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给我们思考上述两个问题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在该著作中,普罗普比较了以下四个事件:

甲、国王给了英雄一只鹰,这只鹰把英雄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乙、老人给了舒申科一匹马,这匹马把舒申科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丙、巫师给了伊凡一只小船,小船载着伊凡到了另一个国度。

丁、公主给了伊凡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现的青年把伊凡

①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② 同上。

③ [美]邓迪斯:《结构主义与民俗学》,张紫晨编:《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页。

带到了另一个国度。

通过比较普罗普认为：“在以上例子中，不变的成分和可变的成分都已显现出来。变化的是登场人物的名字（以及每个人的特征），但行动和功能都没有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个民间故事常常把同样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这样，按照故事中的人物的功能来研究民间故事就是可行的了。”^①关于民间故事中的功能，普罗普进而指出：“研究表明，功能的反复出现是惊人的。我们看到，巴巴、加卡、莫洛科、熊、林妖和鬼首领考验继女并给她报偿。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在一个民间故事的几种版本中确认那些总是做出同样行动的人物，尽管他们会有很大的差异。功能实现的实际意义是可变的，因此是一种变量。莫洛卡的行为便不同于巴巴和加卡。但就他们的功能来说，则是不变的常量。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问题，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物的功能是民间故事的基本成分，它们可以和维谢洛夫斯基所说的‘母题’（motifs）和贝迪耶所说的‘要素’（elements）相比。”“正像诸神的特征和功能可以彼此转换，而且还可以最终由基督教的圣徒所继承，民间故事人物的功能也几乎按照同样的方式相互转换和吸收。显而易见，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这一事实说明了民间故事的双重特征：它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的，又是统一态的，重复发生的。”^②

普罗普所说的“功能”和“母题”其实是同一个文学单位。普罗普将“功能”研究放在动态的文本生成史中间，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观察“功能”，或者说“母题”的“常”与“变”，从而使母题研究具有属于自己的疆域。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现代批评开始用母题

① 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来描述和分析其他叙事文学中那些反复出现于不同文本中的构成成分,从而使“母题”这个主要局限在民间叙事研究的学科术语,上升为能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文学理论范畴。

因此,母题首先是具有结构功能的文学元素,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言说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可以被人们识别的结构语言形式。强调“母题”在结构上的“功能性”,在具体的研究中对整个叙事中具有行动意味的“功能性母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样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吕微先生就曾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功能性母题’的意思是说,在一段相对完整的叙事文本中提取和确立母题时,仅仅将目光盯在那些故事角色的行动环节上,而不考虑句子(我们暂时将故事简化为一个有着主、谓、宾结构的句子)谓语以外的其他成分,但是同时,功能性母题又意味着它的提取和确认最终不会脱离具体的叙事文本,不作脱离具体文本的类型化抽象,以利于故事类型的分析、研究。”^①

应该说,“功能性母题”是一个建设性的学术术语,在这里,母题研究和叙事类型化密切相关。研究那些反复出现于不同文本,且具有“功能性”的母题,使我们对“母题”的考察和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文本之间“母题”的对比研究也相应成为可能。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不妨看这样一组小说:鲁迅的《故乡》、王以仁的《还乡》、孙俊工的《归家》、芦焚的《果园城记》、巴金的《憩园》、柳青的《喜事》,这几部作品分别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手,其“基本主题”也各有差异,实现还乡“行动的人物”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的”,是一个“变量”,但人物的行动环节上,还乡行为的“功能”作为叙述的“最小单位”,却是反复出现在

① 吕微:《神话何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不同的文本中谓语位置上的“不变的常量”,是“统一样态的,重复发生”的。现代小说将“还乡”这个“同样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且被“几乎按照同样的方式相互转换和吸收”。因此,从母题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可以重新整合现代小说文本。而事实上已有的针对现代小说文本的研究常常将其置于某一流派、思潮和时代语境之下予以考察,予以文学史定位,这样的考察和定位固然可使复杂的文学史现象和丰富多彩的文本趋于明晰,但与此同时也给文本之间建立更广泛的关系带来困难。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史上某一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因而,文本之间跨越不同流派、思潮和时代语境发生关系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从母题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重新整合,回到文学自身,找寻到不同文本构成的“常量”和“变量”,有利于某一文本和其他文本以及文学传统中文学原型之间对话关系的建立。这在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还很薄弱,而母题研究的视角则使这样的研究成为可能。

二、母题的结构原则和母题链

母题的结构原则同样早已纳入研究者的视野。阿兰·邓迪斯在《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一文中“将普罗普的类型学框架应用于美国印第安民间故事之中”。阿兰·邓迪斯认为:“民间故事可以含义为一系列的母题的连续。母题链中可能充满着各种不同的母题,而且,对于那些特定的母题链来说,一系列特殊的、连续的母题可以表明为一个母题群。同时,他还吸收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大量的美国印第安故事是从不平衡向平衡发展运动的。不平衡性可以用一些东西过多或另一些东

西过少来表述,这样,“民间故事即是怎样去掉剩余的东西和如何结束缺乏状况这种关系的简单组合”。据此,他把美国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由简到繁,区别为由两个母题、四个母题和六个母题构成这样三种情况:

美国印第安故事的一种形态是由两个母题构成:缺乏(L)和缺乏的终止(LL)。在“放掉积蓄的水”这一故事的马莱西特人异文中,有一只巨兽挡住了世界上所有的水(L),一位民族英雄制伏了巨兽,并且将水放掉了(LL)。一个建立在相同母题模式基础上的维什兰人故事是这样的:“哥伦比亚有一个民族,那儿的人没有眼睛和嘴(L),他们通过嗅鲑鱼进食,山狗打开了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在一个尚未出版的上切哈利人故事里,“从前,地球开始裂成碎片(L),一位有很多磨石的铸造者决定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他这样做了,拯救了人类(LL)”。虽然仅有两个母题的序列构成的故事并不很多,但的确有一些。可以这样说,两个母题的序列构成了美国印第安民间故事最低限度的定义。

一个更加普遍的母题系列由以下四种母题构成:禁止、违禁、后果、试图逃避后果……在一个斯万皮克故事中,一个小女孩的姐姐告诫他不要去射一只靠近水边的松鼠(禁止),这位小孩射了一只靠近水边的松鼠(违禁),当他去找回已落入水中的箭时,他被一条鱼吞下(后果)。最后,这条鱼直接游到了他姐姐那儿,她剖开鱼腹,弟弟得救了(逃避)。在一个利卢埃特人故事里,一位老人警告一些孩子,出外打鱼时不要嘲笑地叫鲸的名字(禁止),孩子们嘲笑并一直叫着鲸的名字(违禁),正当这时,一条鲸游过来了,并吞下了他们(后果)。鲸直接游到岸边,在那里,人们打开鲸腹,孩子们逃了出来(逃避)。

较长的美国印第安民间故事,可以由一些较短的母题模式的结合来组成。一个常见的六母题综合体是由缺乏、缺乏的结束、禁令、违禁、后果、试图逃避后果组成的。在俄耳浦斯故事中,男人失去了他的妻子(L),但是他不违反禁忌的话(禁止),他重新获得或是可以重新获得她(LL)。那个男人不可避免地违反了禁忌(违禁),再次失去了他的妻子(后果)。为了证明在一般的结构模式中的内容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可以将俄耳浦斯故事与祖尼人的“小姑娘与蟋蟀”故事作一比较。一位小姑娘发现了一只会唱歌的蟋蟀,想把它带回家去(L),蟋蟀和她回到了家里(LL),但是,警告她不要碰它、玩弄它(禁止),女孩子和蟋蟀玩,逗弄它(违禁),蟋蟀的胃部突然破裂而死(后果)。两个故事可以用表格的形式列表如下:

母题	俄耳浦斯	姑娘与蟋蟀
缺乏	男人想把妻子从死亡边缘救回家里	女孩想把蟋蟀从田间带回家中
缺乏的结果	男人这样做了	姑娘这样做了
禁令	警告男人不要回头看他的妻子	警告姑娘不要碰蟋蟀
违禁	男人回头看了	姑娘碰了蟋蟀
后果	男人的妻子死去了	蟋蟀死去了
试图逃避	——	—— ^①

同样再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部 20 世纪中国小说,像我们前面讨论的鲁迅的《故乡》、王以仁的《还乡》、孙俊工的《归家》、芦焚

① [美]阿兰·邓迪斯:《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1—303 页。

的《果园城》、巴金的《憩园》、柳青的《喜事》，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除了“还乡”这一“功能性”的母题综合体自身可以拆解成延宕、连续的母题链，其他的母题和母题综合体又会在叙述过程中楔入、组合进来，因此，所谓的“还乡”其实是母题链的一环，鲁迅的《故乡》、芦焚的《果园城》和巴金的《憩园》在“还乡”的实施和失效的叙述逻辑进行的过程中，将“启悟”的母题又组合进来；孙良工的《归家》在“还乡”的延宕的叙述逻辑中，交织进“寻找”的母题；王以仁的《还乡》则将“还乡”的实施和实现，结合进“悼挽”母题。通过这样不同母题之间的组合、构成，一些母题链孕育和生成，有些则因为被许多作家反复运用而固定为模式。

三、文化母题的积淀与传衍

找到这些母题的结构模式其意义何在呢？邓迪斯认为找出这几种结构模式并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这种分析具有如下四种作用和意义：第一，它能够对内容极不相同的民间故事作出结构形态学的陈述。第二，它是一种新的窥视在文化传播形式中确定文化内容的新技术。第三，有助于判明某一地区的文化状况。“欧洲与美国印第安民间故事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是在一对相关的母题要素，例如缺乏与缺乏的结束之间，插入母题的数量。插入母题的数量可以被看成是民间故事‘母题深度’的特征。与欧洲民间故事相比，美国印第安故事的母题深度要浅得多。”第四，结构分析最杰出的贡献是有助于将不同种类的民俗事象作跨种类比较^①。

邓迪斯的“母题观”其实已经深入到对母题的结构模式所蕴涵

^① [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第291—303页。

的文化内容的关注。母题不仅具有“功能性”，同时它还有“文化性”、“心理性”。在这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尝试把他所分离出的结构模式与整个社会（和世界）相联系。在对前辈学者“母题观”的仔细辨析后，邓迪斯认为：“如果讲述故事的过程包括三个方面：1. 讲述者；2. 故事全文；3. 听众，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法和结构主义只注意故事本文而忽视了他部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很明显，民俗学者不仅应该研究讲述故事时的表演，还应该研究讲述者个人美学观念以及不同的听众对故事本质的理解。”^①“如果我们把民间文学题材和体裁中存在的结构类型成功地分离和描述出来，将会有助于人们了解以下几点：具有那种文化的人民的文化实质以及使用这种文化的人所具有的认识范畴，思想方法和具体的行为。毫无疑问，对民间传说或其他文化材料（语言、写作文学及其他）所做的结构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洞悉世界观。”^②“普劳浦（普罗普——作者注）主要关心的是识别俄国神仙故事的直线式结构。而列维-斯特劳斯则试图识别非直线的对立的样式，也就是存在于神仙故事中的词法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探求潜在的，而不是探求他认为的表面显示的直线结构。……通过精确的结构分析，民俗学者可以很好地了解到民间传说是如何包含和联系一个社会的重要隐喻。对这些隐喻的类型的分析和解释将为我们了解各处人民的世界观和行为提供无与伦比的见识。”^③在我们对母题的思考过程中，应该意识到母题不仅具有结构上的功能性，同样凝聚了深厚文化和心理，充满象征和隐喻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一些重要母题的考察，应

① [美]邓迪斯：《结构主义与民俗学》，张紫晨编：《民俗学讲演集》，第 553 页。

② 同上书，第 556 页。

③ 同上书，第 557—569 页。

该有远较民间故事母题研究宽广和丰富的文化和心理内容,其研究的领域也应该相应扩展到功能性母题组合,结构的“叙述空隙”,研究自然、地域、环境、人物及其性格的描写中和特定的时代语境发生的关系。所以,像前面提到的几部小说,可以从母题的结构模式上窥见其“作家用意”的差异,就像陈鹏翔从主题学角度所说的:“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①而且一旦我们将研究深入到对文本自然、地域、环境、人物及其性格的描写中和特定的时代语境发生关系,我们将能进一步感受到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上更具风格化的东西。

不仅如此,应该指出的是某一母题的结构功能和文化、心理蕴意并非孤立和静态不变的,任何一个母题都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性。从这种意义上,具有功能性、文化和心理内容的母题又是一种层层积淀的传统,像“还乡”这样的母题的原型甚至可以上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在其不断的牵延和传衍过程中,这些母题带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心理内容,成为某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精神史、心灵史的见证。因而,“主题学的一个方面是主题史,意指主题学的主要成分的历史。对于主题和母题、典型和惯用语的发展、变化以及持续性的研究可以解释和阐明人的根本兴趣。正是因为文学真实地反映和表现了人的这些兴趣,主题和母题研究属于人文学科的才智史。因此,主题和母题的历史分支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其中包括社会哲学和少数民族心理学领域。

①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论文集》,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页。